

陈 立 德 城下

上



An abstract ink wash painting in shades of purple, black, and white, featuring bold, expressive brushstrokes that create a sense of depth and texture. The painting serves as the background for the top half of the book cover.

城 下 上

陈 立 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七 年 · 北 京

内 容 说 明

《城下》是深受读者欢迎的长篇《前驱》的续集，反映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同北洋军阀吴佩孚所进行的三次惊心动魄的大战役，最终实现了“直捣武昌，饮马长江”的战略目标。

小说歌颂了叶挺为首的独立团官兵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蒋介石、吴佩孚、唐生智、刘玉春等历史人物在这场大搏斗中的角逐；揭示了社会上各种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同时还描写了青年人美好动人的爱情生活。

作者勾画出风起云涌的时代风貌，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事物。全书气势磅礴，情节跌宕起伏，既有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又有缱绻柔情。

责任编辑：彭沁阳 胡德培

城 下（共两册）

Cheng Xia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585,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30 $\frac{9}{16}$ 插页4

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300

ISBN 7-02-000186-6/1·187

书号 10019·4220 定价 5.25 元

当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第十师、十二师和独立团取得了平江大捷的胜利之后，北洋军阀吴佩孚在湖南部署的汨罗江防线就全部发生了动摇。受吴佩孚委任的湘军总司令叶开鑫的主力早已沿粤汉铁路退往岳州；国民革命军的第七军和第八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湖南省城长沙，担任前锋的部队也都抵达了汨罗江一线。第四军在攻占平江后，只是很快打扫了战场，安顿了伤号，并未驻下休整，便又以独立团为前锋，向湘鄂边境交界的幕阜山区进军了。虽然指挥官们知道幕阜山是从湖南通向湖北的最后一道也是最险峻的一道屏障，但是吴佩孚没有料到他所倚重的大将陆运涛会如此迅速地失守平江，因此对湘鄂边境的幕阜山区并没有调集重兵防守。第四军就是要尽量抢在北洋军的前面，翻越幕阜大山，减少通向武汉的阻力，加速北伐战场的军事进展。

现在，翻开湘鄂两省的地图，只要懂得一些军事知识的人都会看到：除了湘鄂交界的天然屏障幕阜山之外，通向武汉的另一道险峻关隘便是湖北境内的汀泗桥了。这个粤汉铁路上的小车站，距离武昌只有九十多公里，北洋军向这里调集队伍十分方便和迅速。五年前吴大帅就是凭借汀泗桥

的天险，挫败了北征的湘军数万之众，稳定了南方的局势，开始了他雄霸中原、控制全国的鼎盛时期。因此，谁都可以料到，吴大帅必将在这里部署重兵，以逸待劳，扭转湖南战事连遭失败的不利局面。

正当吴佩孚向汀泗桥调兵遣将的时候，从广州出发兼程赶往前线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也已经到达了湖南株州，准备从这里乘火车进驻省城长沙。

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就设立在几节刚刚改装好的头等客车的车厢内。其中一节是蒋介石的办公室：中间安放着一张宽大的办公桌，桌后有一张可以转动的皮圈椅，隔桌另一面也有两张皮垫弹簧靠背椅；他的座位后面高悬着孙中山的遗像和他自己亲手恭录的正楷“总理遗嘱”；两旁靠窗摆着两行沙发，地板上铺着红色的地毯；一边的墙壁上挂满了两广、两湖、河南、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示着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和进攻态势；另一边窗上挡着白色纱帘，从外面看不清车厢里面的情形。其余的车厢，分别住着参谋处、副官处、机要科、秘书科、警卫团和俄国的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

这列专车就停靠在株州车站最边沿的一条偏僻的轨道上，四周戒备森严；前面那一节牵引的机车已经升火待发，许多在站台附近露营的士兵都已收拾好了行李和炊具，军官们在车厢外面忙碌地走来走去，都在等候着总司令蒋介石传下“出发”的命令。

这时候，蒋介石刚刚在株洲城里参加了党部为他举行

的各界人士欢迎会，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回到自己的专车上。他的机要科长兼私人秘书王亚夫给他送来了厚厚一叠从前方和后方发给总司令部的文电，这些电报中有前方最新的军事进展，敌情变化，以及后方留守广州的一些文武官员们的动态。本来，蒋介石每天清晨五时起床，六时进早餐，然后第一件事便是浏览批阅经过王亚夫摘选的这些文电，不过今天因为早餐后就到城里参加党部的欢迎会，他才破例把这个日程改变了，屈指算来，他离开广州已有一个多月，由于粤汉铁路从韶关到株洲这一段最艰险的路程还没有修通，他们这一个月来差不多都是乘小木船或轿子在湘粤交界的崇山峻岭中跋涉。沿途的炎热和劳累，使他只是盼望着这艰苦的旅程早日结束，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想前方和后方的事情。到达株洲后，距离前线更近了，这使他对战场形势和敌我双方情况的了解也更清楚了许多；他感到在前线所发生的一切远比他原先所预料的要顺利，就象一个曾经准备倾家荡产、下了大注的赌徒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一样，他对北伐革命的前途变得越来越坚定自信，并且认为这正是他作为最高统帅决策和指挥正确的结果。

蒋介石在军事上当然决不是一个庸才，但过分精明的投机钻营心理和变幻多疑的性格，妨碍他成为一个能作出正确判断并能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去夺取全局胜利的伟大军事家。他虽然在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和日本东京士官学校专门学过军事，但他一生在军事上的成就却远没有政治上的成就那样显著和得心应手。他虽然没有象一些外国政

治家那样进什么专门研究政治的大学深造,但也并非无师自通,这一半得力于他自小受到曾国藩等人的思想熏陶;一半得力于他后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黑社会里的那一段复杂难忘的经历。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蒋介石就正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混合着封建礼教和流氓政治的畸形社会里所造就出来的适应时势的“英雄”,这就是他能平步青云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代有一句名言:“为人主者只须善于将将,不必善于用兵”,蒋介石这一段成功的道路也证明了这个格言是十分正确的。

在正式誓师北伐,即将离开广州向前线出征的那些天,蒋介石就为了组织总司令部和留守后方的人事部署颇费了一番苦心。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选择一个能干的参谋长和确定留守后方的人选。按照冠冕堂皇的说法,广东是先总理多年苦心经营的革命策源地,如果说得直截了当一些,这个地盘就是一块不能轻易丢掉的肥肉。因此,在他出师北伐以后,把这个地盘交给什么人来留守,就确实是大有学问的。只可惜他自己的嫡系部队还太少,顾得了江浙就顾不了两湖;顾得了前线又顾不了后方。他不禁想起汉高祖刘邦所写的那首《大风歌》来: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是啊,如果他蒋介石手下有一百个象叶挺那样智勇双

全而又能象范桐那样俯首帖耳听命于他的将领的话，他又怎会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样的感慨和忧愁呢？他在经过了几天的苦心思索，权衡了种种利弊得失之后，终于最后决定把留守广东的重任，交给粤军第四军的军长李济深。一来是因为他的第四军正在前线担任西部战场的主力，这样的安排会对他的部下是一种激励，使他们在前线更能义无反顾地去奋勇拚命；二来也因为这李济深虽是粤军的军长，但他自己的原籍却是广西，并非广东的地头蛇。将来北伐大功告成之后，当他蒋介石要实行全国江山统一之时，这个人也会比那些有根有底的地头蛇们更容易对付。当蒋介石把这样的安排去征询他的智囊姜仲贤时，那个老谋深算的古董商人也连声赞叹“后生可畏”，认为他现在玩起大手腕来是更加得心应手，圆熟自如了。

蒋介石听了姜仲贤的赞扬后，又更加踌躇满志地笑道：“为了稳住这个家伙，表示对他的信任，我对他说：‘中正此次出师北伐，成功则固然不会再回广州；万一不能成功，也决不再回到广州了。’那家伙听了，两眼笑成一条缝，连忙客气地说：‘北伐成功之日，也即总司令凯旋回粤之时，任潮当率留守后方的文武大员，迎总司令落驾于百里之外。’娘希匹，他心里只怕就盼我别再回来哩！”

“先给他吃点定心丸，你在前方也免得后顾之忧。”姜仲贤又问道，“还有李福林的第五军，你准备怎么安置他？”

“娘希匹，这家伙也是个拆烂污！”蒋介石不禁又恼火地骂道，“平时他开会从不发言，象个泥胎坐在那里，什么事都

唯唯诺诺，可你摸不清他心里在想什么。他的那些队伍都是土匪，一直就驻在河南那边，官匪不分，谁也调不动他。这回也只好让他留守广州算了！”

姜仲贤平心静气地点头道：“这倒也好。李济深留在广州，就得在底下给他安这种不听话的地头蛇。听说河南那块地方，盗匪如毛，还全亏他这种大土匪管小土匪的办法，要不闹得无法收拾。李福林这家伙，好在没有多大野心，他是在烟馆里帮客人点烟灯出身，现在能做到军长就觉得心满意足了。你只要不断他的油水，他在后方倒不会坏你的事情。”

蒋介石也笑嘻嘻地说道：“这倒是真的。娘希匹，老子刚当上总司令没几天，别的那些军就都来争军饷，要武器。这个说那个多了，那个说自己少了，吵得不可开交。只有李福林倒还老实，给他多少就是多少。队伍要都象他那样，我这个总司令也就好当多了！”

“便宜不是货，是货不便宜。”姜仲贤又念起他的生意经道，“天理良心，象叶挺独立团那样的队伍还真是货真价实，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有些家伙，本事也有一点，可就是野心比本事还大，都想当叫鸡公！你看象广东的李济深、潘振山、陈真如；广西的李宗仁、黄绍雄、白崇禧；湖南的谭延闿、程颂云、唐生智，就都是这样的刺手货！”

蒋介石点点头道：“对他们这些人，我现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且装阿木林。可要是谁不够朋友，想暗地对老子砍条斧，娘希匹，老子就不信他比共产党还难治！”

“湖南方面，也不是五个手指一般齐的。”姜仲贤好象是在评论古董成色似的慢慢说道，“论声望和资历，当然以谭组庵为最高，此人面善心狠，八面玲珑，哪方面都可以用他作号召。不过你现在已经抬他当了国民政府的代主席，占了汪精卫的位置，也算是位极人臣，他不会再怀什么异心了。程颂云精明能干，恃才傲物，在湖南早已有取谭组庵而代之的抱负，他拚命反对唐生智归顺，尽量讨好共产党和广西方面，也正是想得到他们的支持，日后好同唐生智争个高下，当他的湖南王！”

蒋介石说道：“这回我把程颂云的第六军放在东部战线，封了他个前敌总指挥，也算给他很大面子了。他们到株洲后就直接开往江西，根本不进长沙，这就同唐生智碰不到一起了。至于将来湖南的地盘到底归谁，我对他说：‘颂云兄追随总理在前，唐生智归附革命在后；论功行赏，当然要有先后之分了。’”

“这个话说得好。”姜仲贤赞赏地点着头，又深沉地说道，“不过，日后程颂云未必能斗过唐生智。姓唐的这家伙翻云覆雨，非同一般。他靠吴佩孚的支持赶跑了赵恒惕，后来又不买吴佩孚的账，最后叫吴佩孚打得没有退路了，这才过来跟我们联络，让我们出兵帮他去打吴佩孚。这家伙脑后定有反骨，你到了前线，还得对他多留点心。”

蒋介石也嘲笑地说道：“谭组庵和程颂云一提起这个人，都是一肚皮气。他们说，唐生智就是靠跟赵恒惕当打手，成了他的亲信，才爬起来的。这样的人要革命，除非狗

改得了吃屎。不过，他们这两个何尝不也是这样？娘希匹，我也听说，唐生智在他的队伍里，培植亲信，要求部下象儿子服从老子一样地听他的话。他身边还养了个和尚，整天为他抽签算命，说他的命相如何如何好，他也把那个和尚捧得象神仙一样。娘希匹，看样子这个家伙的胃口还不只是想当个湖南王哩！”

“不管他想干什么，你到了那边，先摸清他的底牌，看看他的斤两，不要打草惊蛇。”姜仲贤发挥着他那一套处世待人的生意经道，“再一个是要多结交当地的绅士名流，让他们知道你蒋某人是礼贤下士的，到时候他们就能帮你说话，这些人就是将来的地盘和民心。”他重新点燃了一根雪茄烟，接着又说下去，“还有，听说湖南那边的国民党部完全是由共产党操纵的，你去了也先当作不知道，千万不能把广东的这一套带到那边去。打吴佩孚、孙传芳还要靠他们那些人出力。”他又把话题一转，谆谆告诫道，“你现在就好比开磨坊的老板拉驴上磨一样，要让它乖乖地听话，就得先舍出点粮草把它喂饱。当然肚皮有大有小，脾气有好有刁，喂多少粮草也要看牲口的成色。总之是一分钱一分货，都要用在刀刃上；这样才能将本将利，一本万利！……”

虽然姜仲贤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但他确实也说出了一些生活的哲理。古时曾经把州官叫作“牧”，不就是这个意思么？《圣经》里也把上帝的使者称为“牧人”，把芸芸众生称为“羔羊”，那意义就更加明显了。那些牧人，只要善于把“头羊”驾驭好，再多的羊群，也会跟在后面乖乖听话了。

接着，他们又对参谋长的人选，进行了一番斟酌。蒋介石先前就听说广西军中李宗仁的助手白崇禧颇有才干，人称“小诸葛”，一直担任第七军参谋长，把原先一盘散沙的广西队伍治理得井井有条，便想把他收拢到自己身边来。不料进行试探后，白崇禧却以“才疏学浅、难当重任”为辞，故意不肯答应。这使蒋介石颇有些恼火了，他向姜仲贤谈了这些情况，表示想另找别人，姜仲贤却劝他还是要以大局为重，从长计议，然后又从容地问他：

“你想还有哪些人担任参谋长合适呢？”

蒋介石看着他道：“原先倒想过三个人：李济深，钮永健，白崇禧。现在已经决定让李济深留守广州。钮永健对上海那边的人事关系很熟悉，我想先派他去做点联络工作。现在看起来，还只有白崇禧合适一些了。”

姜仲贤半闭着眼听着，一面点点头道：“白崇禧是广西方面的智囊，你把他收拢过来，对日后统一两广是一步好棋。再说，你现在重用了他们那边的人，也显得你和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到前线也好拚命用力。这就好比是做合股买卖，他的股分越大，到公司需要贴钱的时候他才越舍得下血本！”

蒋介石对姜仲贤这番生意经当然早已融会贯通，但他的心情感到有些愤懑地说道：“只是白崇禧这个家伙还在推三阻四，故意卖关子。他总说自己资望太浅，年龄还轻，不敢当此重任。娘希匹，我看说穿了，他就是嫌参谋长那个头衔还不过瘾，想在那前头挂一个‘总’字才威风！”

“他说过这样的意思？”姜仲贤关心地问。

“话虽不是那样露骨，可意思是明明白白的。”蒋介石带着嘲笑的口气说道，“他说，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将军德高望重，老谋深算；如果能由李济深将军来兼任总参谋长，他自己情愿当个副职，协助总参谋长的工作。娘希匹，他已经知道李济深要留守广州了，还说这样的话，不是明明为他在争吗？”

姜仲贤笑着点点头道：“你就给他加上一个‘总’字。反正一个字又不要钱买，你还舍不得？拿一个字换个参谋长，让他在你身边乖乖地听话，这笔买卖是只赚不蚀的。”

蒋介石听了，犹豫了一会，终于说道：“好吧，老子这回就好人做到底！我今天就给白崇禧发个电报，把我决定让李济深以总参谋长名义，代行总司令职权留守广州的任命正式告诉他，让他担任副总参谋长兼前方参谋长，全权处理一切军务。这回他心里该舒服了吧？老子对他们广西方面总算够朋友啦！”

“你这块肥肉一丢，不怕他不张嘴来咬。”姜仲贤很有把握地说道，“据我看，广西方面的班底，是以李宗仁为头脑，以黄绍雄和白崇禧为左右手。白崇禧虽然智谋过人，素有‘小诸葛’之称，可是他偏重军事，又太自负，非经邦济世之才。黄绍雄有政治野心，为人狡诈多端，但好夸夸其谈，而且斤斤计较小利，军事上没有多少建树，终不过只能起帮闲政客的作用。只有李宗仁这个人胸有城府，不可小视；上个月他来广州活动，一副仁人长者的样子。我看他待人谦和，

不露锋芒，貌似平庸，实有大志。这个人你须要用心对付：将来他可能成为你最得力的盟友，也可能成为你最危险的敌人。”

这时正在旁边的机要科长王亚夫尖声插言道：“李宗仁上次在广州住了四五十天，到处攀亲拜友，同共产党的人和俄国顾问都有接触。他向广西方面发电报都是使用自己带的密码，有时就借用第四军的留守电台，不知道他们暗地里搞了些什么鬼名堂！”

蒋介石接口说道：“我知道这家伙到广州来，是想探听虚实，摸摸行情，看看我手里有多大力量。李济深因为抓住了一个叶挺独立团，想用共产党的力量来捞点北伐资本，他就尽量鼓动李宗仁跟他联合，一起来将我的军。说什么要是我蒋某人不愿北伐，他们第四军和第七军合起来就能把吴佩孚打垮！李济深为了做样子给别人看，还接受共产党的提议，把叶挺独立团先派出去。娘希匹，这些手段我都明白，李济深的胃口是想夺我的位置，想要当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这个家伙，怕也成不了大器。”姜仲贤扁着嘴轻蔑地说道，“他想靠共产党的力量来打天下，可共产党那一套真要实行起来他能吃得消？听说他最近又缠上了一个唱广东小曲的姑娘，名叫紫罗兰，才十三四岁年纪。这样的军客，你叫他去受共产党的那些戒条不是要了他的命么？”

蒋介石也咧着嘴笑道：“娘希匹，我早看穿他了。他接受共产党的独立团，一来是想扩大个人的实力；二来是跟叶

挺拉过去的私人关系。其实，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消灭共产党，比我的性子还急。三月二十号那天，他以为我真的要跟共产党翻脸了，抢着向我提出要取缔农民协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禁止一切工农运动，宣布共产党为不法之徒。当时就叫我顶回去了。”

“他还是脚踩两只船。”姜仲贤老于世故地指点道，“他向你提出那些反共议案，实际上也是想向你试探一下，摸摸你的底牌，他好从中取利。对这样的家伙，还得多防他一手。你这回出发到前线以后，留他坐镇广州，也不能让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抢在你的前头，闹得局面不可收拾。”

“这一点我早有布置了。”蒋介石看了王亚夫一眼道，“我让机要科在我出发以后，派专人监视李济深在这边的情况，随时把他的谈话和行动用密电报告我。”

王亚夫在旁边立刻恭敬地说道：“我已经新编好了一套密码，安排一位可靠的同志负责，让他随时和我们前方联络。”

姜仲贤满意地点点头，又道：“李宗仁虽是七军军长，可他的老家还在广西；七军的那几个师长又都是些叫鸡公，翅膀硬了一个也不会听他的。所以要特别注意他跟广西方面的来往，对李宗仁他们几个多下点工夫。”

“上次李宗仁回去，我给了他们七军一千支步枪，四挺重机枪，两部无线电台。”蒋介石显得很慷慨地说道，“我对他说，以后只要第一军有的，也要先照顾第七军。看样子他还知点好歹，不象四军的潘振山那些家伙，娘希匹，就象你

欠他的债一样，你再给他好处，他嘴里也没有半个谢字。”

“潘振山这种二杆子货，刚猛有余，谋略不足，终究成不了气候。”姜仲贤喝了两口茶，放下茶杯道，“十师师长陈真如比他有心计，可军事上又不行。我看四军最可畏的，还是独立团团长叶挺。这个人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就很器重他，论地位他只应当在潘振山这些人之上，可他甘愿放弃高位，接受共产党的命令去充任独立团团长，不能不说是具有相当的政治头脑。再看他在湖南指挥的这几仗，真可说有制胜千里的大将之才。此人若能为我所用，足可抵得上十万精兵！”

蒋介石连连摇头道：“他比陈独秀还赤化得厉害。听说发生‘中山舰事件’后，他在独立团讲话，把我比作第二个陈炯明！娘希匹，要不是还要让他带队伍北伐，老子现在就能收拾了他！”他的语气变得凶狠起来，有点咬牙切齿的样子，额上的青筋也暴出来了。

姜仲贤温和地劝慰他道：“宰相肚里划得船，说什么由他说去，只要他在前头同吴佩孚的队伍拚命，你什么话都只当没听见。这样的人重气节，不象有些家伙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他以前对孙中山忠心耿耿，现在对共产党忠心耿耿，焉知将来不能被你感化过来，忠心耿耿为你干事？”

蒋介石点点头，说道：“对共产党的一些人，我倒是真心想用他们。前几天放出李元龙的时候，我还亲自同他谈了一次话。我说：‘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就是校长处罚学生处罚错了，学生也不应当记他的恨，因为校长毕竟是

为学生好的。’后来我又说，‘即使你记恨我，我也还是要重用你；我要安排你在总司令部做事情，或者到前方去带兵。’这家伙大概吓破了胆，说他不愿再带兵，只想到前方做点宣传工作。我批了几百块钱，让他去找邓演达，到政治部办剧团去了。”

姜仲贤赞扬地连连说道：“对，对！要赚大利息，就要舍得出本钱。就象俗话说的：欲求生受用，须下死工夫。孙中山一生吃尽了苦头，东跑西颠，搞了十几年的北伐，也没打出过韶关。你现在人还没离开广州，眼看湖南湖北就都快到手了，这样大利息的买卖，天底下还能到哪里再找去？……”

蒋介石想起姜仲贤在说这些话时的神情，不觉又一次得意地笑了。从前方和后方发来的这些文电中，也都报告着他在这些日子里煞费苦心进行部署所取得的成功：平江之战已得到完全胜利，这个胜利使吴佩孚大为震动，匆忙地从北京赶回了武汉，湖南境内已再没有北洋军的嫡系主力了；后方广州的情况也很平静，正如姜仲贤所预料的，李济深接受了总参谋长和留守后方的重任后，十分志得意满，整日在广州歌舞升平，没有出现任何图谋不轨的迹象。何应钦指挥的第一军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也顺利地肃清了东江潮梅地区的残余敌人，正在进行向福建方面发起进攻的准备。东路军所属的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和第一军两个师，也都已集结在赣东和赣南地区，随时可以向孙传芳的队伍发起进攻。蒋介石看完这些电报，他感到目前最使人担